

“我与他”：跨文化传播中的他者审视

——基于纪录片《美国工厂》豆瓣和IMDb影评的分析

杜忆竹 徐开彬

【摘要】他者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对待他者的态度体现出审视他者的不同方式。论文对纪录片《美国工厂》在豆瓣和IMDb的影评展开主题分析,旨在探究“他者是如何被审视的”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对他者的认知有三种情境,即先赋自我与绝对他者、关系中的他者,以及消失的他者。第一种情境将“我”与“他”视为相对独立的,第二种情境则认为自我与他者是相互构成的,第三种情境意味着对跨文化差异的否定性解读以及对我—他关系的转换。最后,论文讨论了他者审视过程中的情境化问题。

【关键词】他者审视;文化身份;我—他关系;情境化

【作者简介】杜忆竹,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开彬(通讯作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潇湘学者特聘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新闻大学》(沪),2024.2.57~70

作为一种文化身份,他者源自差异,并在社会和文化交往中面临被“他者化”的可能。“我与他”的跨文化交往是一个互为他者的过程,认知他者的方式深嵌于“我与他”的关系之中。《美国工厂》是Netflix公司出品的纪录片,由史蒂文·博格纳尔和朱莉娅·赖克特执导,获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在内的多项大奖,于2019年8月在美国上映,引起广泛关注。影片以2008年金融危机、通用汽车公司在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工厂倒闭为背景,讲述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工厂旧址投资修建福耀玻璃厂并雇佣中美工人后发生的故事,其中跨文化传播的冲突与弥合相互交织。该片在豆瓣和IMDb的影评呈现出跨文化传播的在线情境,论文试图通过其中的跨文化交流来揭示“他者是如何被审视的”这一问题,致力于寻求跨文化多元解读的可能。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他者源自差异(difference),它首先来自不同的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根据身份的传播理论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简称CTI),种族/民族特征,比如肤色和衣着风格等,是将旅居者和移民划分为外群体的重要标准(Hecht, Warren, Jung, & Krieger, 2005)。同时,语言差异也使得旅居者和移民成为主体文化(host culture)的外群体。作为文化的核心,文化价值观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将个体或群体区分开来,当旅居者和移民进入一种新的文化,也往往成为其中的他者(Liu & Kramer, 2019a)。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他者被分为三种类型:异国化的他者、刻板化的他者和被排斥的他者(Liu & Kramer, 2019b)。首先,由外在差异引发的来自主体文化的质疑和凝视,将外来者视为异国化的他者。其次,刻板化的他者源自将简化的标签赋予特定的群体,而忽视其复杂性。最后,被排斥的他者产生于主体文化群体强调或“赋予”的外群体负面特征。内群体成员倾向于通过歧视、偏见、孤立和拒绝等行为来贬低甚至排斥外部群体,从而将自己与外群体区分开来,尤其是他们感受到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时。

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他者化具有破坏性,往往使外来者感到疏离和不安。当群体间关系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时,对外部群体的排斥会更加明显(Wagner, Becker, Christ, Pettigrew & Schmidt, 2012)。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对差异与他者通常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方面,他者即不确定性,是恐惧的源头和原型(鲍曼, 2003)。这类观点将差异视为误会和冲突的来源,认为只有消除差异才能达成更有效的沟通(Blasco, 2004)。与之相应,文化适应研究主张外来群体与主体文化相适应(Kramsch, 2002)。然而在后现代视角下,跨文化差异不需要被克服,它是一种由流动性和多样性定义的生活方式(Harman, 1988)。很多后现代的文化现象都导致了“流动个体”(liquid individuals)的形成(Dervin, 2012: 181-194)。另一方面,跨文化传播的对话视角也是讨论差异和他者的一种路径。对话理论反对自发性和自足性的主体概念,认为自我理解必须建立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上,并偏向情境化的跨文化交往(Xu, 2013)。

对他者的认知可能导致“他者化”(othering)的出现。“他者化”由“他者”衍生而来,是社会表征的一种形式,包括“对象化他人或群体”或者“创造他者”,从而忽视个体的复杂性和主体性(Abdallah-Pretceille, 2006)。Holliday 等人(2010)认为刻板印象是导致他者化的主要原因,他者化是指人们将负面特征加诸他者而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而 Mudambi (2013: 287)则认为他者化是将“他者的差异性转化为‘我们中的一员’的相似性”。上述两种定义体现出对自我—他者关系的不同理解,前者强调他者的负面属性,后者则关注“与我相似”的同一性。

有关他者化的研究揭示出他者被审视的两种方式:一是将他者化视为个体和群体在内群体(in-group)中的自我定位过程,创造了“我们”和作为外群体(out-group)的“他们”。这一视角下的他者化是排外的,自我较之他者处于更高的位置,二者不是平等互惠的关系。二是将他者化看作一个彼此定位的交

互过程,双方都将自我放置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进行认知(McAllum & Zahra, 2017)。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浮现(emerge),因此有关他者的定义也反映出自我定位(Hatoss, 2012)。Gülerce(2014)将这一过程称为“自我化”(selfing),即个体通过将“非自我经验和历史”置于他者范畴之下,从而创造出单一意义的自我。勒维纳斯批评西方哲学传统对他者的了解建立在“与自我的同一性”之上,而不是与他者的相遇。因此,他提出了先于存在关系的伦理关系,将自我从属于他者的文化谦逊(cultural humility)纳入跨文化传播的讨论,并强调“绝对差异”(absolute otherness)的概念,即差异是不可知的,也不能被简化和定义(Ucok-Sayrak, 2016)。

作为一种文化身份,他者既是个人概念的一部分,也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源自自身的知识和社会群体关系的价值和情感意义(Tajfel, 1981: 2)。目前有关他者的身份研究存在三种路径:一是后现代路径,它关注个体如何在与他人的交互中获得和发展他们的身份(McAllum & Zahra, 2017)。二是后殖民主义路径,其基本假设是,他者身份是被权力结构(或殖民者)以霸权方式赋予和强加的,是对自我的重建(Shin & Jackson, 2003),该路径偏向于呈现具体历史和社会政治语境中的文化差异(Xu, 2013)。三是解释学路径,Gadamer(1991)将身份视为受历史影响的、根植于解释学情境的意识,在这一路径中,文化身份被视为“在群体中表达和传播的象征符号和文化建构”(Shin & Jackson, 2003)。具体而言,解释学路径认为文化身份形成于文化认同过程,涉及先赋自我(the ascribed self)和宣称自我(the avowed self)两种文化身份;他者位于相似的经历和意识结构之中,而不是自我—他的二元结构。总之,基于共享意义和价值的文化身份是解释学路径关注的焦点。

本文偏向于“我与他”的关系视角,在具体的跨文化交往情境中探讨“他者是如何被审视的”这一问

题。本文通讯作者徐开彬认为批判对话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强调在关系中认识自我与他者;二是关注在地化与情境化的身份特征和跨文化交往,同时对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宏大叙事保持批判精神(Xu, 2013)。他指出,在情境化的互动中,自我或他者可能不认同所属群体,他们的身份也许是流动的;同时,只关注情景化的互动而忽视跨文化宏大叙事(如“他者化”),也可能出现虚幻的跨文化在场平等交往。因此,本文没有以既定文化背景或其他属性将对话双方视为固定的“我”或者“他”,而是在具体的情境/对话中以整体视角看待“他者如何被审视”的过程。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纪录片《美国工厂》在豆瓣和IMDb的影评,而非电影本身,其原因有二:一方面,该片呈现了包括中美文化、企业和工人等不同立场在内的多重跨文化传播现象,但它代表的是导演希望呈现的内容,作者认为对纪录片内容的分析也许会囿于一些常识性结论。另一方面,豆瓣和IMDb的影评是来自中美观众的原始数据,内容丰富且充满细节,更能体现跨文化传播的真实情境。纪录片呈现出中美文化元素的交织状态,因此中美观众的影评大都会涉及跨文化解读。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不是有关中美影评的比较研究,而是试图以整体视角来讨论跨文化传播中的“他者”是如何被审视的。本研究整体上将豆瓣用户有关美国的评论和IMDb用户有关中国的评论视为对“他者”的解读,其他特殊情况则根据具体内容进行分辨。

截至2020年11月27日,纪录片《美国工厂》在豆瓣共有30,229条短评和814篇影评,在IMDb有148条评论,其中豆瓣影评篇幅较长,表达内容也较丰富,而IMDb则无评论长短的区分。基于质性研究样本的典型性,作者按照“有用/helpful”的排序从豆瓣和IMDb各自选择前50条影评作为本文的分析数据,共计100条。文中涉及的英文影评均由作者翻译

为中文。作者逐一阅读全部影评,并在此过程中使用Ncapture for NVivo对网页内容进行抓取,然后将其导入质性分析辅助软件NVivo 12。由于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文献阅读,作者没有“脑袋空空”地进入数据分析,而是试图从理论与数据两端并行,以期在中观层面归纳审视他者的可能方式。一方面,作者带着从文献中获得的与“自我”“他者”相关的概念进行数据分析,在分析中丰富其内涵或者结合数据对其做出全新的解读;另一方面,多样化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为研究提供了进行开放性编码/范畴的可能。遵循主题分析的编码原则,作者对每一篇影评进行归纳式开放编码并提出编码和范畴,然后基于这些编码/范畴的共性提炼出次主题,再进一步提炼出主题(见下页表1)。

三、研究发现

基于本文的个案,“他者”通常在三种情境中被认知。首先,先赋自我与绝对他者的认知情境将二者分离开来。自我不是一个整体概念,而是在国族、群体和个体等层面有所分化;绝对他者既暗含了对沟通可能性的否认,也体现出对认识“真实”他者的尝试。其次,自我与他者在关系情境中被连接。站在他者立场的自我想象体现出跨文化视角的自省,也一定程度意味着对他者的不信任;同时,“我一他”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即博弈、对比和类比。最后,他者在一些情境中可能消失。一方面,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在宏大的历史情境中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当下的自我与他者可能寻求新的共同他者,并形成一个新的“我们”,从而导致当下他者的消失。

(一)先赋自我与绝对他者

1. 先赋的自我

先赋的自我通常在遇见“他者”之前便已形成,是一种由“我们”共同认可的身份。较之他者,先赋自我的边界是相对明确的;而在“我们”内部,它随着认知的不断调整而变化。“我们”即使同属某一社会分类,却不是同质化的,它由国家、群体和个体层面

的“自我”共同构成,因此先赋自我首要讨论的问题是“谁是我们”。

首先,整体的自我概念通常源自国族意识,“中国人”“美国人”成为天然的归属。

“我看完这部纪录片,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人为了有一份工作,可以让渡太多东西了。”(豆瓣用户:刘康康)

“作为美国人,我们想赚钱,过上好日子,不满足于勉强度日,也不满足于从董事长的盘子里得到一根骨头。”(IMDb用户:mpboyalanir-54038)

从内部来看,国家层面的自我概念是个体自我认知的放大,即从中国工人到“中国人”、从美国工人到“美国人”,用某一群体的状态代表全部国家同胞的认同。国家成为唯一一个集体性想象的单位,当需要一个集体作为自我认同的依托时,就只能奔向国家(项飏、吴琦,2020:252)。这不但造成对自我的泛化认知,也可能导致对他者的不完全解读。从外部来看,整体的自我概念强调与他者的区隔,主要体

现在两方面:一是单方面维护自我文化,比如一位IMDb用户认为“在意识到需要什么来改善我们的文化之前,我们将维持现状”。二是对他者的遮蔽,即“我可以从纪录片中看出这个国家有多少麻烦,但这与中国无关”。

其次,自我概念也体现在作为局部群体的一员。如果整体层面的自我是个体认知在一定程度上的放大,那么群体层面的自我则是个体在共同社会背景下“由己及人”的转化。

“对于中国工人,我应当提及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然而,这些工人表现出了他们的工匠精神和对工作的奉献精神。”(IMDb用户:anjoanna)

“他们中的许多人年纪大了,年纪大的工人往往会慢一点,尤其是在制造业岗位。当你看纪录片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支持那些工人,并希望他们能扭转局面。”(IMDb用户:samoanul)

上述内容中的评论者不属于中国或者美国工人

表1 开放性编码/范畴、次主题及主题

主题	次主题	开放性编码/范畴	参考点
先赋自我与绝对他者	先赋的自我	国族意识	10
		自我概念	10
		个体叙事	6
	绝对的他者	他者天然存在	3
		对沟通可能性的否定	9
		承认自我认知局限	5
关系中的他者	他者立场的自我想象	“真实的”他者	12
		与他者一致的观念	4
		承认他者的不同	3
	关系中的他者	发现自我的不足	3
		博弈关系	12
		对比关系	25
消失的他者	否定性解读	类比关系	10
		将“差异”置于宏观语境	3
	“我—他”关系的转换	超出自我认知范畴	3
		寻找另一个共同他者	12
		“我—他”关系的多元呈现	8
		相似属性之上的共同话语	12

群体,但他们都表现出对该群体的同理心。有趣的是,这一群体认同过程暗含“我—他们—我们”的逻辑。由于评论者不是工人群体的一员,他们首先以第三方视角将工人群体视为“受教育程度低”“来自贫困农村地区”“年纪大”“动作缓慢”的“他们”,随后基于工作的奉献精神、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理解等普遍价值和情感,他们成为工人群体的支持者,即从“他们”到“我们”。

最后,个体叙事呈现出纯粹的自我。这一自我概念既不被裹挟于国家话语,也不依附于某一群体。个体层面的自我通常由纪录片的内容直接触发,其定位也更加多元。

“我的母亲是个无比强悍的女人,1995年起去故乡附近的工业区打工……最心酸的一次,母亲做工时中暑了,被工友送回村子,那时候我读高中放暑假,带她去诊所,她坚持不去,说吃两颗冰棍就好了……”(豆瓣用户:王云超)

个体层面的自我解读较为分散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纪录片任一内容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投射,比如由纪录片中的工厂联想到母亲在故乡工业区打工的情形。先赋自我在个体叙事中更加具象,存在于真实的生活经历。

整体而言,先赋自我不是单一、笼统的概念,“自我”形成于国家、群体和个体等不同层面。由论文的个案可以看出,宏大情境提供了理解自我的背景,但中观和微观情境则更加具体和多元地呈现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2. 绝对的他者

在先赋自我的基础上,人们习惯于将自我与他者分隔开来。其划分依据大致有三:一是将他者视为一种先天的存在,即文化差异。二是对沟通可能性的否定,认为我—他之间无法沟通。

“这是两个群体,始终不能简化成两个个体。两个人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沟通形成理解和默契、磨合各自冲突的观念,但两群人毫无可能。”(豆瓣用

户:avarus)

“《美国工厂》的矛盾,不仅仅是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更是过去的历史与当下发生碰撞之后产生的结果。”(豆瓣用户:闵思嘉)

以上评论体现出对“交流无奈”的可能解释。一方面,我—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建立在他者对自我的理解之上,是一种将他者“自我化”的期许。另一方面,交流无奈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承接前文的内容,个体层面的自我是更加具体和多元的,而交流一般发生在具体和多元的个体之间,因此整体或群体间的交流成为奢望。此外,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群体和文化之间,它同样是“历史与当下的碰撞”——时空交叠的差异使得我—他之间的相互认知更加不易。三则是对自我的反思,承认自我的认知局限。

“我原来一直以为美国人一定不会把这点小钱当钱……可是我们又对美国人真正了解多少呢?”(豆瓣用户:秀山鲤鱼)

这里强调对另一群体可能存在的误读,间接确认了他者的存在;对误读的反思则意味着从绝对他者到试图理解“真实”他者的尝试。

一个“真实”的他者通常包括正向的解读,比如IMDb用户jasonalaporan评论道:“我认为中国人是勤劳的。他们来到这里创造了以前没有的工作机会,这不是坏事!”那么,“真实”的他者如何被呈现呢?

首先,客观数据是了解他者基本情况的途径之一。通过数据的呈现,评论者试图理解一个相对客观、现实中的他者。

“首先来看看Dayton(作者注:代顿市)所在州Ohio(作者注:俄亥俄州)的经济表现数据,金融危机过后的十年……总的就业量从570万一路降至520万,要知道2017年Ohio的总人口才不到1200万。这样断崖式下跌,带来的就是许许多多普通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豆瓣用户:Eggy)

其次,将他者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反驳

当下对其形成的固有印象。

“如果说美国工人懒惰,那如何解释历史上美国曾经是第一制造业强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展现出了惊人的生产效率和规模、为打败日德做出了重大贡献?”(豆瓣用户:西溪路蜉蝣C)

最后,纪录片呈现的内容是部分的他者或另一个他者。通过跳出纪录片本身,评论者意识到他者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在内部有所分化;同时,纪录片之外的背景信息意味着认识“真实”他者的不同视角。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经历这样的工作,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更好的选择。”(IMDb用户:akiralinlong)

“要看懂《美国工厂》,需要我们跳出这部电影本身来看待。‘奥巴马投资出品’并不只是一个噱头……无疑这部作品背后是有政治考量的。”(豆瓣用户:Enjolras)

在面对差异时,人们偏向从先赋的自我出发去认知他者。即使“自我”为认识“真实”的他者做出种种努力,这种割裂式的认知方式仍可能导致对“谁是我们”这一问题的认知偏差,也更容易形成对他者的误读。

(二)关系中的他者

1. 他者立场的自我想象

在他者的立场想象自我,意味着主动将自我“他者化”。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自我将真实存在或者假想的他者评价纳入自我认知的范畴。笔者发现,自我的他者化过程源自跨文化自省,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自我本身持有与他者一致的观念,借助他者强化之。无一例外地,他者立场的自我想象都是消极的,这也体现出对他者的某种不信任。同时,他者立场是相对的,自我陌生化是另一种对自我的“他者化”。陌生化源自对纪录片中自我的不认同。总之,他者立场的自我想象是不平衡的,由于他者的介入,自我认知趋向于对他者的依附,甚至完全地“他者化”。

2. 关系中的他者

自我往往通过参照他者或与他者互动来认识自己。在互动关系中认识他者意味着建立“我一他”之间的联系与意义,这种连接可能是对“我一他”关系的积极探寻,“很喜欢他们采访、追踪和展示人们的不同观点”(IMDb用户:codysmalley);也可能是对他者的不理解,甚至感到困惑。在跨文化交际的现实情境中,这些困惑在一定程度上被厘清。“我一他”之间大致存在三种关系,即博弈关系、对比关系和类比关系。

博弈关系基于一种比较心理,将自我与他者看作竞争的双方。在本文的案例中,博弈关系处于从过去到现在的转变之中,是一个“新故事”。

“这是一个新故事:不是人们以往所熟悉的外国资本与中国工人,而是中国资本与美国工人。”(豆瓣用户:新京报书评周刊)

“九十年代通用汽车到中国开合资厂,那时是美国工程师到上海来,一手一脚地培训中国工人,而这片里的人物身份则倒了过来。”(豆瓣用户:Luc)

“对于这些美国工人来说,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经历。”(IMDb用户:kenbond-53805)

博弈关系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资本与工人”“工程师与工人”“老板与劳工”“主人与工人”,是优势一方对另一方的引领。在这些博弈的主体中间,“工人”群体始终位于劣势的一方。从表面看,自我与他者的划分来自国别前缀,比如“中国资本与美国工人”或者“美国资本与中国工人”,实际的博弈关系可能还涉及跨国别的阶层问题。除了从过去到现在的转变,博弈关系还体现在当下与未来的进程中。

这里的博弈关系体现为对抗性,即使一方“占据优势”,另一方也将“采取行动”进行制衡,不存在某一方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形,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弈。按照韩炳哲的观点,对抗性是他者存在的重要前提(韩炳哲,2019:60)。

对比关系则更加中立,在提及一方的同时必定

提及另一方,使自我与他者的位置相对平衡。对比关系使自我对他者的认识更加具体。同时,对比关系也被置于两种情境之中,即同向对比和反向对比。

“我认为两种模式都有优点。中国工人虽然很拘谨但很能干,美国人虽然效率不高但各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肆意嘲笑美国人的文化。”(豆瓣用户:Brahms)

同向对比是指评论者对待双方的态度一致,将二者置于相对平等的地位进行比较,没有孰优孰劣的认知,比如认为“两种模式都有优点”。这并不意味着对“我一他”差异的抹杀,而是在一致的评价体系中看到二者的不同。

反向对比主要来自评论者的主观比较和一些共识性的观念,体现出明显的态度倾向。

“如果一定要讲群体差异,我注意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在美国,任何一个工人,无论教育程度如何,都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诉求;但中国工人的表达往往含混不清。”(豆瓣用户:百毒)

在与他者的反向对比中,自我反而成为劣势或者应当被批判的一方。在一定程度上,“我一他”的对比关系有助于更为全面的自我认知。从他者的立场来看,反向对比是对某些常识性观点的反思。

(三)消失的他者

他者何以消失?韩炳哲认为是由于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甚至将其称为“同质化的暴力”(韩炳哲,2019:1-2)。然而,在本文的跨文化传播情境中,“消失的他者”是一种审视他者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同质化,它涉及对跨文化差异的否定性解读和“我一他”关系的转换。

1. 否定性解读

他者审视中的否定性解读是将“差异”置于较为宏观的语境中,从而弱化甚至否认差异的存在。从“我一他”双方的关系来看,二者之间不存在“某一种文化的胜利”。当文明荡然无存,作为文化身份的他者自然也不复存在。

“这便是制造业的困境——一艘沉没的船无法容纳任何人……没有任何个人/公司/政府能阻止这艘船沉没。”(IMDb用户:anjoanna)

与之类似地,作为“一艘沉没的船”,制造业的衰颓对于中美工人和工厂的意义都是否定性的,这些曾被视为“他者”的对象都将随之沉没。

“我不想说其中的美国与中国谁对谁错,因为这种历史进程,谁都没法想象。”(豆瓣用户:maxSonic)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每个人都得承认,即便固守原有阵地……也终将于事无补。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智慧去寻找世界的全新解药,因为这是任何历史经验都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豆瓣用户:闵思嘉)

从自我认知的范畴来看,该纪录片中体现的跨文化差异既无法被价值判断,也没有应对之道,因为它是“谁都没法想象”“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虽然差异仍然存在,他者却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因为这其中的“我一他”之分只是客观存在,却超越了人类现有的认知范畴。否定性解读常以消极的视角将“我一他”联系起来,认为二者的差异在宏观历史进程中显得微不足道;当历史的巨轮碾过,“我与他”一损俱损。

2. “我一他”关系的转换

“我一他”关系的转化则体现在更加具体的方面,将已有的他者身份转化为其他的“我一他”关系。首先,通过寻找另一个共同的他者,“我与他”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站在同一阵营。

“无论美国工人还是中国工人,最终还是会输给机器人。”(豆瓣用户:PirateRadio)

这实际拓展了文化意义上的他者,将其延伸至未来技术层面的“机器人”。同时,原有的“我一他”关系可能被彻底颠覆,导致文化意义上的他者随之消失。

“这哪里是什么文化冲突,分明是劳资矛盾!”(豆瓣用户:隔壁车间王主任)

“与其说是文化差异,不如说是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豆瓣用户:PirateRadio)

“劳资矛盾”“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人、生命价值尊重程度的差异”等一系列转换,改变了固有的“我一他”关系;新的“我一他”划分标准在于劳动者与资本的身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即使原有的他者“消失”,在“我一他”关系转换的过程中,很可能不断涌现出新的他者。第三方他者的出现促使当下的自我和他者形成一个新的“我们”。

其次,基于“我与他”的相似属性,评论者试图在整体层面寻求一个同时包含“我与他”的“我们”。共同话语可以来自新划定的群体,从而打破原有的国别边界。同时,共同话语的建立也源自一个更为宏大的“我们”。

“请各位企业主能平衡个人和企业的关系。毕竟,我和你们都身处其中,身处这个时代。这是他们,也是我们!”(豆瓣用户:笑子剑客)

“美国和中国制造业的工人是某人的母亲/父亲/女儿/儿子,他们是我们地球同胞的一部分,他们想要的与所有人类想要的相似:养家糊口。”(IMDb用户:snadolsky)

“不管我们的肤色是什么,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不应该因为皮肤的颜色而得到不同的待遇。”(IMDb用户:jasonalaporta)

“我们”不但同为当下时代的一员,也是“地球同胞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与他者的地位是相似的。基于一些普适性的关系或理念,“我们”都是“某人的母亲/父亲/女儿/儿子”,共同拥有最朴素的情感和愿望。同时,宗教语境中的“我们”更为一致,纵然有肤色的差异,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最后,共同话语中的“我们”是自我与他者的融合,然而他者的消失不一定意味着双方的共存,也可能是一方的消失。

概言之,他者的消失大致存在三种情形:一是在宏观历史情境中的“一损俱损”,即自我与他者都不

复存在;二是在特定情境中寻求另一个共同的他者,当下的“我与他”形成新的“我们”,从而导致当下他者的消失;三是处于优势地位的“自我”对他者的抛弃,造成一方的消失。“消失的他者”有其具体的发生情境,它也是一种审视他者的方式。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纪录片《美国工厂》豆瓣和IMDb影评创造的在线跨文化传播情境,论文以过程视角探讨了“他者是如何被审视的”这一问题。源自差异的他者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自我密切相关。从二者的关系出发,本文发现三种审视他者的方式。第一,与他者相遇时强调自我的先赋身份,将二者视为“绝对差异”。自我不是整体、单一的概念,其内部有具体的分化;当自我提到“我们”时,实际是无意识地选择某一层面的身份,比如整体层面的国家、群体层面的“工人”以及个体层面的纯粹自我。与之对应地,他者被视为先天的存在,“我一他”之间沟通的可能性被否认。第二,将自我与他者置于关系中进行认知,既包括在他者立场想象自我这一类深入交互的关系,也涉及博弈、对比和类比等相对平行的关系。第三,对他者的审视走向“他者的消失”。一方面,对我一他关系的否定性解读将二者置于较为宏大的语境中寻求同一性;另一方面,当下的我一他关系被转换,“我与他”在共同他者之下成为一体。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审视他者的方式不是按照先后顺序推进的,而是杂糅地存在于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之中。

他者不是问题,而是创造了跨文化多元解读的可能,对待他者的不同态度体现出他者审视方式的情景化(situating)。情景化源自语言学的语境化(contextualizing)概念,后者的基本含义是如果不考虑语言使用的语境就无法理解词汇,忽略语境则容易在讲者和听者之间产生误解。跨文化传播中的语境视角超越了语言学范畴,它把对跨文化话语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梵·迪克,2003:26)。跨文

化传播学者通常使用“情境化”这一术语,倡导建立基于跨文化关系的情境性理解(单波,2021)。其中,批判对话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尤其重视情境化的跨文化互动和竞争话语的局部意义(Xu,2013)。之所以强调情境化的重要性,是因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发现的规律并不一定可以推测出情境化的跨文化互动(Levine, Park & Kim, 2007)。跨文化传播中的情境化通常指在他者与自我交互的文化背景中对他者文化的地方知识进行理解,本文从认知过程的视角讨论了“我一他”关系认知方式中的情境化问题。

论文所揭示的“情境化”的他者审视主要有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他者应当被置于具体的“我一他”关系中被认知。一方面,自我与他者的内部是有所分化的,不能被笼统地视为一个整体。在先赋自我与绝对他者的认知方式中,自我被划分为三个层面,即整体、群体和个体,对自我的不同感知直接影响其对待他者的态度。另一方面,他者的审视方式一定程度取决于“我与他”的关系。在关系中认知他者,其既意味着跨文化交流中的自省,也展示出对他者的不信任;同时,关系中的他者变得更加具体,可以规避一些抽象概念导致的刻板印象。第二,他者应当被置于具体的跨文化交往情境中被认知。我们既要避免局限于语言学的语境,也不能囿于天然的、类型化的和单一的文化背景,而应当在中观层面寻求一个理解他者的跨文化情境。具体情境中的“我与他”是流动的——二者在既有情境中可能互为他者,也可能在认知方式的转变之中不断产生另一个共同的、全新的他者,从而导致现有他者的消失。

他者认知方式的情境化跳出二元的文化背景,关注更加微观和具体的层面,以及一些相关的新议题。例如,Markovich(2015)讨论了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在认知“他者”过程中的作用,即私人领域成为定位自我的情境,将有关他者的讨论与直接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隔离开来。私人领域可能是创造特殊性的方式,也可能是构建普遍化诉求的方式。与之类似地,本文在先赋自我和绝对他者的认

知方式中讨论了个体叙事中的自我定位。与之不同的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探讨某一具体情境中的他者审视,而是在更加中观的层面讨论审视他者的可能方式,既包括个体叙事等个体层面的自我定位,也涉及我一他关系中对差异的承认或消解。自我和他者是相互构成的,对抗或二元的关系存在于他者审视的具体情境之中,但不是跨文化传播过程的全部。差异的存在为审视他者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并且有关他者的审视是在具体情境中进行的。本文基于个案提出了三种有关他者认知过程的可能情境,即先赋自我与绝对他者、关系中的他者和消失的他者。未来的研究也许可以在其他具体情境中进一步探讨“他者是如何被审视的”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 [1]韩炳哲(2019). 他者的消失:当代社会、感知与交际[M]. 吴琼,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2]齐格蒙特·鲍曼(2003). 现代性与矛盾性[M]. 邵迎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3]单波(2021-10-19). 建构情境化的比较传播学[N]. 中国社会科学报(04).
- [4]托依恩·A. 梵·迪克(2003). 作为话语的新闻[M]. 曾庆香,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 [5]项颀,吴琦(2020). 把自己作为方法[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6]Abdallah- Pretceille, M.(2006). Interculturalism as a Paradigm for Thinking about Diversity.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17, 475-483.
- [7]Berry, J. W.(1980).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In Padilla, A.(Ed.), *Acculturation: Theory Models and Some New Findings*(pp. 9-25). Boulder: Westview.
- [8]Blasco, M.(2004). Stranger to Us than the Birds in Our Garden? Reflections on Hermeneutics,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Difference. In Blasco, M., & Gustafsson, J.(Eds.), *Intercultural Alternativ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pp. 19- 46). Copenhagen, Denmark: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 [9]Dervin, F.(2012). Cultural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and

Othering. In Jackson, J.(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pp. 195–208). Abingdon: Routledge.

[10]Gadamer, H. G.(1991).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1]Gui, Y., Berry, J. W., & Zheng, Y.(2012). Migrant Worker Accultur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6(4), 598–610.

[12]Gülerce, A.(2014). Selfing as, with, and without Othering: Dialogical(Im)possibilities with Dialogical Self Theory. *Culture & Psychology*, 20(2), 244–255.

[13]Harman, L. D.(1988). *The Modern Stranger: On Language and Membership*.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4]Hatoss, A.(2012). Where are You from?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xperiences of ‘Othering’ in the Narratives of Sudanese Refugee-background Australians. *Discourse & Society*, 23(1), 47–68.

[15]Hecht, M. L., Warren, J. R., Jung, E., & Krieger, J. L. (2005).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Gudykunst, W. B. (Ed.),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pp. 257–278). Thousand Oaks: Sage.

[16]Holliday, A., Hyde, M., & Kullman, J.(2010).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7]Kim, M., & Hubbard, A. S. E.(2007).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Global Village: How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6(3), 223–235.

[18]Kramsch, C.(2002). In Search of the Intercultural.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6(2), 275–285.

[19]Lebedko, M. G.(2014). Interaction of Ethnic Stereotypes and Shared Identity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54, 179–183.

[20]Levine, T. R., Park, H. S., & Kim, R. K.(2007). Som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6(3), 205–221.

[21]Liu, S.(2007). Living with Others: Mapping the Routes to Acculturation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1(6), 761–778.

[22]Liu, Y., & Kramer, E.(2019a). Cultural Value Discrepan-

cies.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Integrated Identity: American Migrants’ Experiences of being the Other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4(1), 76–93.

[23]Liu, Y., & Kramer, E.(2019b). Conceptualizing the Other in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Review, Formulation, and Typology of the Other—identity.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5), 446–463.

[24]Markovich, D. Y.(2015). The Personal as Political: The Function of the Private Space in Contextualizing the ‘Other’ in Jewish–Palestinian Encounters. *Journal of Peace Education*, 12 (2), 167–181.

[25]McAllum, K., & Zahra, A.(2017). The Positive Impact of Othering in Voluntourism: The Role of the Relational Other in Becoming Another Self.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0(4), 291–308.

[26]Mudambi, A.(2013). Another Look at Orientalism: (An) othering in *Slumdog Millionair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4(3), 275–292.

[27]Shin, C. I., & Jackson, R. L.(2003). A Review of Identity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Reconceptualizing Cultur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 26, 211–240.

[28]Tajfel, H.(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Ucok–Sayrak, O.(2016). Attending to the “Face of the Other”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nking and Talking about Difference, Identity, and Eth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9(2), 122–139.

[30]Wagner, U., Becker, J. C., Christ, O., Pettigrew, T. F., & Schmidt, P.(2012). A Longitudinal Tes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German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Outgroup Derog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3), 319–332.

[31]Warren, J. T.(2008). Performing Difference: Repetition in Contex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4), 290–308.

[32]Xu, K.(2013). Theorizing Differen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Dialogic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80(3), 379–397.